

敦煌漢簡校釋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文昌論叢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白軍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漢簡校釋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文昌論叢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白軍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漢簡校釋 / 白軍鵬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25-8673-8

I. ①敦… II. ①白… III. ①敦煌(歷史地名)—簡(考古)—研究—漢代 IV.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89242 號

## 敦煌漢簡校釋

白軍鵬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7.5 插頁 2 字數 569,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8673-8

H·183 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得到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

東北師範大學青年學者出版基金資助

中華字庫工程第七包“兩漢、吳、魏晉簡牘文字的搜集與整理”子項目資助

## “文昌論叢”序言

論叢以“文昌”為名，有以說也。

其一，文昌路是目前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坐落之所。二〇〇九年，應學校整體規劃的調整要求，文學院奉命從據守二十年（一九八八—二〇〇九）的“紅樓”搬遷至文昌路這座小院的三棟舊樓。學院裏年長一點的先生們都記得，這裏本是中文系的舊地，中文系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候就這裏締造的。故以“文昌”為名，為了紀念文學院的滄桑歷史、紀念曾在這裏創造不息、為我們留下寶貴遺產的前賢們。

其次，常有同仁說文昌路是文學院的“福地”。此番搬遷，當時只道是“暫厝”，不意倏忽又六年。綜觀文學院的歷史，重回文昌路這段時期，學院在全院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學科發展走上了復興。而“文叢”中的作者，多數是這段時期入職學院的。從學校規劃來看，文學院遲早要離開文昌路。取“文昌”之名，也有意銘記這段時期裏新老學人團結進取、急起直追的歷程。

最後，從字面意義上，“文昌”寄寓着文化昌明、文學昌盛、文章昌茂、文運昌隆等意涵，故以“文昌”命名叢書，代表我們對文學院、對東北師範大大學、對中華文明的祈願。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前身，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建立的第一所高校——東北大學的國文系，從一九四六年至今，她已走過了七十年。七十年中，歷代學人在這片沃土上耕耘奮鬥，把文學院建成了人文學術與教育的關外重鎮，在國內有着較高的影響力。

十年前，在建院（系）六十週年之際，學院組織出版了《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語言文學論集（一九四六—二〇〇五）》，這部煌煌一百四十萬言的大書，為院史上最重要的成果進行了文獻總結。去年，王確教授開始主持編選“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史文庫”，把學院歷代學人的學術代表作重新編訂，統一裝幀出版，首批出版著作十種近三百萬字，這些都展示了這座古老學院的豐腴成就。近年來，文學院有了許多新的氣象和變化，“文昌論叢”必然是這一頁歷史的見證之一。這套書首批推出八部著作，與歷史巡禮式的文獻編纂和學術史文庫式的代表作展示的思路不同，“文昌論叢”着力助推新生代學者。叢書的諸位作者，年齡最大的四十歲，最小的三十二歲，半數以上屬於“八〇後學人”，而且其中絕大多

數是在最近三年才加盟文學院，他們的才思與文筆代表着文學院的未來。近年來，文學院形成了一種共識：前賢們深厚的積澱是我們事業發展的土壤，但未來的持續發展，要依靠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這個共識正在逐漸升華為一種“尚少”的文化：無論從觀念上，還是從管理上（比如科研獎勵向青年教師“倒掛”的激勵機制），學院都有意向年輕人傾斜，以期更快更好地促進青年教師成長，以承擔起文學院的未來。這一文化已在文學院近年的發展實踐中產生了積極效應，在校內外產生了良好反響。當然，我們知道，若沒有文學院這些前輩和中年學者們的理解與支持，就不可能培育和形成這種文化。“文昌論叢”的推出，既受惠於這一文化，反過來也驗證這一文化，並豐富它的內涵、為它積累經驗。集中推出三十多歲青年教師的著作，這在東師文學院歷史上還是首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希望這套論叢能兼具“導夫先路”的作用：隨着目前新生代的持續成長，以及未來新生力量的不斷融入，論叢會不斷增加品種、擴大規模，最終形成我們的學術品牌。

“文昌論叢”是文學院青年一代學人的檢閱。從作者的學緣結構來說，他們分別在法國戴高樂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取得博士學位，這反映了學院目前的師資學緣構成更趨向於多元化，人才結構上的新變及其背後蘊含的開放和包容精神，必定對文學院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從學科角度看，“論叢”涵蓋古典文獻、語言學、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和文藝美學，基本囊括了文學院的主幹學科。從研究水準來說，由於多數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形成的專著，經過了嚴格遴選，並非一般性概論或入門式作品，所以都聚焦於學科的前沿問題，形成許多獨具個性的觀點。

東北師範大學社科處為叢書的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學科建設辦公室提出了指導建議，王確、劉雨兩位老師對叢書的出版非常關心，徐強、陶國立為叢書的策劃出版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這套叢書在不同出版社統一裝幀出版，各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對叢書給予了極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同表示謝意。

必須指出，叢書中的多數著作是作者的第一部書。起步之作，難免稚嫩，深願學界高明之士能夠有以教誨。你們對這些著作及作者的批評與指教，就是對東師文學院的莫大支持。我在東師文學院求學七年，回國後又在這裏工作七年，人生中許多重要經歷都與這裏難解難分，我從中受益良多，也承擔了師友們的許多期待，實乃人生中之幸運。借此機會我想向這座學院和老師們表達由衷的敬意，也想以“戒驕戒躁”四字，與各位青年學者共勉。生有涯，學無涯，學問之路正長，這只是一個起點，我們還要日進、日進、日日進，方能不負時代，不負前賢。

李 洋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 目 錄

“文昌論叢”序言 .....	1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敦煌漢簡”的發掘、保存及整理情況概述 .....	1
一、斯坦因所獲部分 .....	1
二、周炳南、夏鼐所獲部分 .....	5
三、建國後敦煌、玉門等地歷次發掘與收集 .....	6
第二節 漢代的敦煌郡 .....	9
一、敦煌郡的設立時代 .....	9
二、敦煌郡的民政體系 .....	11
三、敦煌郡的軍政體系 .....	14
四、敦煌郡的郵驛系統 .....	19
第二章 釋文搜集與校訂 .....	22
第一節 “舊簡”釋文詳校 .....	28
一、斯坦因二探所獲部分 .....	28
二、斯坦因三探所獲部分 .....	113
三、前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部分 .....	141
四、斯坦因二探、三探所獲新刊簡牘的初步整理與研究 .....	145
第二節 “新簡”校釋 .....	185

一、馬圈灣烽隧遺址出土漢簡	185
二、敦煌後坑墩(D20-T11)采集的漢簡	316
三、敦煌馬圈灣烽隧遺址(D21)采集的漢簡	318
四、敦煌小方盤城(D25-T14)采集的漢簡	319
五、敦煌臭墩子墩(D65-T23o)采集的漢簡	322
六、敦煌小方盤城南第一烽隧(D81)采集的漢簡	322
七、敦煌蘆草井子墩(D83·T14c)采集的漢簡	323
八、敦煌小方盤城南第二烽隧(D82)采集的漢簡	323
九、敦煌鹽池灣墩(D22-T12a)采集的漢簡	324
十、敦煌小月牙湖東墩(D57)采集的漢簡	325
十一、敦煌懸泉遺址采集的漢簡	329
十二、出土地點不詳	340
十三、敦煌酥油土出土的漢簡	340
十四、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組漢簡	348
十五、玉門花海出土的漢簡	348
十六、人頭疙瘩所出	354
十七、條湖坡烽隧遺址	355
十八、疏勒河北三墩(清水溝東墩)	355
十九、陝西省博物館所藏敦煌漢簡	359
二十、瓜州縣博物館藏	360
二十一、一棵樹烽隧所出漢代簡牘	360
附錄一 1949年以前“敦煌漢簡”出土地點及著錄對照表	363
附錄二 1949年以後散見“敦煌漢簡”出土地對照表說明	41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敦煌漢簡”的發掘、保存及整理情況概述

### 一、斯坦因所獲部分

漢簡研究濫觴於對“敦煌漢簡”的研究。而所謂“敦煌漢簡”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我國甘肅省疏勒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中所發現的簡牘，其中還包括一小部分的帛書與紙書。

關於其發現、發掘的歷史，《敦煌漢簡》、《敦煌漢簡釋文》以及《中國簡牘集成·甘肅卷》均有介紹。其中，前兩者介紹部分的内容完全相同。在上面這些介紹的基礎上，我們結合著錄情況及最新公布等情況再做一次比較全面的梳理。

二十世紀初，英籍匈牙利考古學家斯坦因(Aurel Stein)在第二次中亞考古發掘中，<sup>①</sup>考察了我國新疆、甘肅等地，發現了大批漢文及以西域古代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各類文獻，其中1907年在敦煌西北的數十個漢代烽燧中掘得很多漢文簡牘。斯氏二探的發掘情況最後形成皇皇鉅著——五卷本發掘報告：《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由牛津克拉蘭頓出版社於1921年出版。此書漢譯通常作《塞林提亞：中亞與中國西域考古記》，在十九世紀末，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1998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因斯氏命名將新疆排除在我國之外，故重新命名為《西域考古圖記》。不過，雖然發掘報告出版遲至1921年，但是在1912年<sup>②</sup>斯氏已經出版了詳細記錄其第二次考古發掘情況的兩卷本《Ruins of Desert Cathay》（漢譯通常為《沙漠契丹廢址記》，由Macmillan & Co. Limited出版），斯氏將所獲各種文

① 斯坦因共進行過四次所謂的考古發掘，第一次在1900—1901年，第二次在1906—1908年，第三次在1913—1916年，第四次在1930—1931年。

② 據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前言中稱該書出版於1911年末，大概是其誤記。

字書寫之文書分別交予當時西方相關研究領域中的著名學者整理，其中漢文材料便由當時法國著名漢學大師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和研究，沙氏選錄了其中清晰完整者，其中他認為屬於漢代者有 708 枚，<sup>①</sup>最後成書出版於 1913 年，名為《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通常譯為《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獲漢文文書》。這批漢文簡牘最初收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大英博物館中的圖書館分離出來，成立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或稱大英圖書館)，這批材料也就隨之收藏於圖書館。

在沙書問世以前，東渡日本的羅振玉便得知斯坦因獲漢晉簡牘並交沙畹整理一事，遂寫信給沙氏索要簡影資料，後者將其手校本寄付羅氏。而羅遂與王國維研究數月，成《流沙墜簡》一書。《流沙墜簡》收錄了沙書中有簡影的部分，共計 585 件，<sup>②</sup>同時收錄了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所獲李柏文書。該書出版於 1914 年，1934 年修訂再版，<sup>③</sup>按照簡牘的內容將其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小學數術方技書”，第二部分為“屯戍叢殘”，第三部分為“簡牘遺文”。第一、三部分由羅振玉完成，第二部分由王國維完成。王氏按簡牘性質分為“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及“雜事”六類，開簡牘分類研究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意義。不過《流沙墜簡》中並未區分漢簡與晉簡，因此 585 枚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晉簡。

在斯坦因二探中發掘出的漢文簡牘中還有兩千餘枚碎簡，學術界通常稱之為削衣或柿。斯氏報告稱“在烽燧(T6b)西北約 16 碼處有一個奇怪的發現。這裏發現了一大堆木刨花，上面寫有漢字，而且總數很可能超過 1 000 個”。<sup>④</sup>其稱蔣師爺(蔣孝琬)已經正確地指出這些碎簡為習字之簡。現在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其內容多與《蒼頡篇》相關，確為習字簡，而且發現地也不僅限 T6b 一處。不過這部分習字簡，沙畹在整理時沒有采用，此後一直未正式發表，最早將這批材料介紹給國內學術界的是郭鋒先生，他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一書中於“附錄二”對此進行了簡要介紹。因並不太長，我們將其移錄於下：

筆者 1989 年調查三探文書時，順便調查了二探未刊木簡，現將所見介紹如下。

據調查，二探所獲漢文木簡均編於 Or.8211 號下 1 - 3326 號內。其中 1 - 992 號即已經沙畹刊布之木簡及少量紙文書。993 - 1351 號，皆敦煌烽燧出土簡(TVI、TX—XVIII 等遺址)，為未刊布者。簡皆寸餘或不滿尺之碎片，或二、三字或十餘字，隸書，漫漶

① 實際上真正屬於漢簡者似為 702 枚。不過魯惟一卻認為沙書中全部的 991 枚簡牘中，有 709 枚被確定為屬於漢代。見氏著《some notes on han-time documents from tun-huang》，《T'oung Pao》，second series, vol.50, liver. 1/3(1963)。而富谷至先生在他的《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一文中卻說這批漢簡的數目是 704 枚。

② 此依何立民先生的統計，見《簡帛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讀〈流沙墜簡〉並論王國維先生簡帛文書研究的貢獻》，《南方文物》2010 年第 3 期。

③ 據日本學者門田明研究，在 1934 年再版之前，該書很可能已有再版。詳參氏著《〈流沙墜簡〉版本考》，徐世虹譯，載《簡帛研究譯叢》第二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73 - 286 頁。

④ 《西域考古圖記》，第 370 頁。

難識者居多。1352—1682 爲尼雅佉盧文簡。1683—1731 爲一探所獲尼雅漢文簡 47 枚，已經沙畹刊出。1732 號爲佉盧文簡。1733—3326 號，計一千五百餘號，亦皆未經整理刊布之二探所獲敦煌木簡。由此可知，二探所獲木簡，其未經刊布之敦煌木簡尚有近二千號（1733—3326 號一千五百餘號與 993—1351 號三百五十餘號合計）。<sup>①</sup>

不過實際情況比郭先生所介紹的要複雜一些，張德芳、郝樹聲先生對此又進行了更爲詳細的調查，發現有些編號下不止有一枚簡，比如 1786 號下有 160 枚，而 3326 號下更有 359 枚之多。而郭書中所謂的 1733—3326 號中亦含有非漢文簡牘，實際的簡數要大於郭氏所統計數。張、郝二氏最後的統計結果是未發表漢文簡牘的數量爲 2 398 枚。<sup>②</sup> 這些簡牘後來經汪濤、胡平生及吳芳思等先生整理，在 2007 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發行。關於這批簡的數量，日本學者藤田高夫先生亦有統計，與張、郝二氏又不相同，可參看。<sup>③</sup>

1913—1915 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三次中亞考察，在 1914 年，於敦煌地區漢代烽燧遺址中發掘出 84 枚漢簡，又在安西和酒泉兩地發現了 105 枚，前者屬於漢代敦煌郡所轄區域，而後者的發現地在漢代屬於酒泉郡管轄範圍。因此陳夢家將其稱之爲酒泉漢簡，<sup>④</sup>這其實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因其與“敦煌漢簡”一同發掘，後來的學者仍將其歸入“敦煌漢簡”。

斯氏第三次考古發掘報告出版於 1928 年，名爲《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通常譯爲《亞洲腹地：中亞、甘肅和伊朗東部考古記》，此書仍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於 2004 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重新命名爲《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斯氏三探所獲漢文簡牘開始亦由沙畹整理，然而沙氏 1918 年因病去世，其未完的工作便由沙氏的弟子馬伯樂（Henri Maspero）接手。而其時正值中國學者張鳳留學法國，馬伯樂招其協助整理這批簡牘，張鳳歸國時馬氏同意將簡影等帶回，不過囑其不要在馬書出版前公布。張氏開始確實遵從與馬氏之約，不過馬書遲遲不見出版，而國內學界期盼這批材料能夠儘快公之於世，尤其是王國維在去世前亦曾因此批材料與張氏通信討論，表達了對這批簡牘的重視。因此在葉恭綽等的極力堅持下，張氏於 1931 年在有正書局出版了斯坦因三探所獲漢文簡牘，這就是《漢晉西陲木簡彙編》，該書由初編和二編兩部分組成：初編全錄沙書圖版，但不附釋文；二編即三探所獲簡牘，基本根據簡文首二字命名，並作釋文。

在張氏書出版之時馬氏尚在研究整理中，至 1936 年完成初稿，不過當時限於經費問題，書稿的出版一再推遲，二戰爆發後馬伯樂夫婦於 1944 年被德國納粹逮捕，翌年不幸死於集中

① 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4—125 頁。

② 張德芳、郝樹聲《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漢簡未刊部分及其相關問題》，《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第 76—80 頁。

③ 《大英圖書館藏スライン將來漢簡の研究現狀報告》，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 2 號，第 49—65 頁。

④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 年，第 200—201 頁。

營，其書稿遲至 1953 年才在倫敦出版，就是《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一書，通常譯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如果張氏書最初沒有出版，國內學術界想見到這批資料恐怕就會更晚了。馬書中包括紙文書，張書則未收，而二書所收簡牘亦有出入，主要是馬書未收而見於張書，這些在本書附表中可以看到。斯坦因三探所獲漢簡現亦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應該指出的是前面所說斯氏二探所獲削衣部分亦不能排除有三探所獲者。

最早對斯氏兩次發掘所獲漢簡進行綜合整理的當屬 1984 年出版的林梅村、李均明二位先生所著之《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該書除釋文較以往各書有較大進步外，最重要的是參照斯氏發掘報告，將所有簡文按出土地編號，同時糾正了沙畹的編號錯誤，最後將這些對比研究的結果製成對照表，頗便學者應用。後來各書如《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敦煌漢簡》、《敦煌漢簡釋文》以及《中國簡牘集成·甘肅卷》等所附對照表均參照其所做。該書的缺點是釋文方面沒有參考當時已經刊布的魯惟一及大庭脩二氏的釋文校訂成果，因此，其釋文雖然有進步卻仍不免留有缺憾。

沙畹書中所公布的漢簡有 708 號，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沒有簡影，馬伯樂書亦有三十幾枚未公布圖版，這其中有十餘枚亦不見於《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因此學者們在利用這些簡牘進行研究時難免會有不便之處。1972 年，大庭脩先生赴歐美訪問調查，主要調查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的“敦煌漢簡”。經過目驗原簡，他首先對斯氏二探部分的簡牘做了釋文方面的校訂，成果就是後來的《敦煌漢簡釋文私考》一文，發表於《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 23 卷第 1 號。<sup>①</sup> 此文後來經姜鎮慶先生翻譯發表在《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上。1990 年大庭氏將所獲得的斯氏二探、三探全部已發表簡文的照片按照林、李二氏所排簡序公布，這就是《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一書，書中結合前人對釋文的校訂及他自己對釋文的研究成果為這些簡牘做了新的釋文，並逐條進行解說。

應該說，此書的出版為斯坦因所獲漢代簡牘的研究做了一次總結，但是由於該書出版於日本，很多國內學者難以見到，因此相當多的學者在研究“敦煌漢簡”時亦未見有引此書者。而且該書中仍然不免留有一些缺憾。首先，我們在該書中沒有發現其引用《流沙墜簡》的情況，釋文方面，其主要依據的成果是沙畹書和勞榘的《敦煌漢簡校文》，其中很多簡牘，羅、王已經有正確的解釋說明，卻未予採納。其次，大概是由於疏忽，有些簡的照片沒有找到，而只能用原來公布的不甚清晰的圖版，比如張鳳書中多於馬伯樂書中的簡影，據裘錫圭先生的實地考察，發現其實就在一個未編號的抽屜中。而該書圖版的清晰度也難以讓人滿意，這除了簡本身保存的原因外還與當時照相和印刷技術不高有關，因此裘先生希望能夠對這些簡牘進行重新的整理。<sup>②</sup>

① 此卷為 1974 年出版，但是有的研究文章認為是 1973 年，不確。

② 裘錫圭《談談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漢簡》，收入《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一書中。

裘錫圭、大庭脩先生以外，就我們所知，對斯氏兩次所獲並已公布的簡牘進行調查者尚有英國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和日本的富谷至以及館野和己二位先生。魯惟一的調查報告《Some Notes on Han-time Documents from Tun-huang》一文，對這些漢簡做了簡要的介紹，值得重視的是其根據目驗原簡的經驗對釋文做了一些校訂。富谷至先生是1992年3月至9月對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漢簡進行了調查，其調查報告的一部分就是《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一文。該文據其目驗，主要關注了簡牘的形制、刻槽、編繩以及簡的重複利用等情況，對於深入研究這批材料具有啓發意義。該文由徐世虹、郝仲平二位先生翻譯後發表於《簡帛研究譯叢》第一輯。館野和己先生的調查是在2005年10月至11月赴英期間所做，其調查報告最後以《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調查記》為名，他以《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一書的排序為據，將有殘斷、刮削等特殊情況的簡如實地記錄下來，亦有一些簡背的情況介紹。

## 二、周炳南、夏鼐所獲部分

1920年，周炳南在軍旅途中，於敦煌小方盤城附近采獲簡牘17枚，其中第17簡有“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字樣。其他簡文殘損較嚴重，不過時代大概與此簡相差不遠。這些簡原藏周炳南處，建國初由政府搜購獲得，現藏敦煌研究院。較早對這組簡進行介紹的是初師賓先生，其在《關於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組漢簡》一文中公布了簡影及釋文，並對部分簡進行了解說，該文發表在《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牛龍菲先生在1983年參觀了這批簡後認為第八枚為五弦琴譜，並譯成現代樂譜，文章發表在《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題為《敦煌東漢元嘉二年五弦琴譜研究》，不過其觀點未得到學術界的響應。其實該簡文字只是寫得草率，並非琴譜，牛文的觀點站不住腳。

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在河西地區進行考古發掘時，夏鼐、閻文儒在小方盤城附近又發掘出76枚漢簡，簡影及釋文由夏鼐以《新獲之敦煌漢簡》為題發表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後該文收入夏氏《考古學論文集》。而簡的發掘情況在閻文儒的《河西考古雜記》中有記載，閻文最初發表在《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12期，後又經增補分上、下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及1987年第1期。<sup>①</sup> 這批材料現藏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值得指出的是夏鼐文中所發表的簡為48枚，還有一把木梳，刻有三行文字，亦收入文中。《敦煌漢簡》、《敦煌漢簡釋文》均稱夏、閻二氏發掘得49枚，《中國簡牘集成》稱48枚以及《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稱四十餘枚就是這個原因。夏文未發表者均較零碎，其實當時夏氏已經編號並作釋文，不過最後大概由於太過零碎而沒有發表。二氏所獲這批簡牘後來全部由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居延漢簡補編》中公

<sup>①</sup> 《中國簡牘集成》稱發表於1986年第4期，未言1987年第1期，不確。

布。因用紅外線掃描，所以《居延漢簡補編》圖版較夏文更為清晰，釋文方面亦有一定的進步。不過夏文公布的那把梳子並未找到，大概已經遺失了。夏鼐、閻文儒所獲漢簡在前面所提到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及《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中均有收錄。

### 三、建國後敦煌、玉門等地歷次發掘與收集

#### 1. 馬圈灣漢簡

1979年6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當時稱文物工作隊）和敦煌市（當時為縣）文化館，在小方盤城以西11公里的馬圈灣發現了一處漢代烽燧遺址及數枚漢簡，此烽燧為斯坦因當年考察時所遺漏。同年9月，在岳邦湖先生的主持下，對該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共開10×10米探方19個，發掘面積達1900平方米，歷時20天結束。19個探方中有15個出土了簡牘。各探方出土簡牘情況《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製有一表，甚便觀覽，我們不妨稍作修改引用如下：

探方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8	合計
簡牘數	2	10	9	18	443	133	42	115	163	26	150	26	26	1	57	1221

不過這個統計似乎有一些問題，在附有《發掘報告》的《敦煌漢簡》及《敦煌漢簡釋文》二書中，均宣稱馬圈灣所獲漢簡為1217枚，二書及《中國簡牘集成》釋文部分“馬圈灣漢簡”亦確為1217枚。《敦煌漢簡》和《敦煌漢簡釋文》後亦均附有探方及簡號對照表，我們發現對照表中探方5從40號簡到480號，當為441枚，與前引表相差2枚，探方8從656號簡到768號，總數為113枚，與前引表中所謂115枚亦相差2枚。這樣，共計1217枚，與釋文之數合。不過我們並不知道探方5及探方8那4枚簡僅僅是因為統計有誤還是後來在整理二書時因遺失而未計入。

除1217枚簡牘外，還有一塊帛書，據《發掘報告》稱該帛書呈長條形，長43.4、寬1.8釐米。上面有一行墨書文字：“尹逢深中殺左長傳一帛一匹四百卅乙株幣十月丁酉亭長延壽都吏稚鉉。”

這批漢簡的時代為西漢晚期及新莽年間，未見明確標有東漢紀年者。簡的內容與此前歷次所發現的“敦煌漢簡”以及“居延舊簡”相近，均記載西北地區屯戍情況，以簿籍、文書為主，也有曆日、書信、字書等內容。在這批簡牘中有一部分以草書寫成，其內容與王莽征西域事件有關，已經有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討。王莽征西域事見於《漢書·王莽傳》及同書《西域傳》，然而均寥寥數筆，語焉不詳。今借由“馬圈灣漢簡”這批相關材料可補班史之缺，是非常值得慶幸的。

“馬圈灣漢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最近幾年，該館擬將所藏秦漢簡牘進行紅外拍攝及整理，“馬圈灣漢簡”亦在整理範圍之內。最近，《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一書出版，該書

由張德芳先生校釋、集解，無論從圖版質量還是釋文準確性上都大大超邁前人。

## 2. 玉門花海漢簡

1977年8月，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花海農場附近的漢代烽燧遺址中采獲漢代簡牘數十枚。據發掘報告稱於此處共發現了木簡、柿片93枚，無字素簡12枚。不過在後面公布的釋文簡中則僅有91枚。這批漢代簡牘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皇帝遺詔。調查報告稱爲武帝遺詔，其後學者各有不同的意見。此外，《蒼頡篇》殘簡的發現也很重要。

此烽燧漢代爲酒泉郡所屬，因此亦當屬“酒泉漢簡”，與斯坦因三探所獲被陳夢家稱爲“酒泉漢簡”者相加有250餘枚之多。這是研究漢代酒泉郡邊塞情況最直接的材料，簡牘現藏嘉峪關長城博物館。

## 3. 酥油土所獲漢簡

1981年，敦煌市博物館在酥油土（或作素由兔）漢代烽燧遺址中采獲漢代簡牘76枚。據發掘簡報介紹“1981年3月，敦煌縣黨河公社社員在西湖酥油土放牧，於酥油土以北的漢代烽燧遺址上發現漢簡四枚。我館聞訊後，立即趕往現場調查，又采集到漢簡七十餘枚”。<sup>①</sup> 這批材料的內容有詔書、律令、檄書、字書、兵書、曆書等。雖然不足百枚，但是有很多有意義的發現。如迄今爲止唯一的一支守御器品，唯一的一支驚候符，以及前未見的擊匈奴降者令殘冊。這批簡牘現藏敦煌市博物館。

## 4. 1990年疏勒河北三墩（當地俗稱清水溝東墩）遺址出土簡牘

據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一文可知，<sup>②</sup> 此處出土了27枚曆日簡，14枚散簡，無字素簡一捆21枚。其中曆日簡爲地節元年曆日。由曆日及紀年情況來看，最早的爲元鳳四年紀年簡，最晚的爲地節三年曆日簡。

## 5. 1998年小方盤城烽燧遺址采獲漢代簡牘

小方盤城出土漢簡此並非第一次，在斯坦因二探時便采獲了近百枚，建國後也曾采集到，詳下文“其他散見簡牘”部分的介紹。這批簡牘發現於1998年，敦煌市博物館爲配合小方盤城搶險加固工程，對城堡南面一小部分區域進行了考古調查，共獲130枚。其內容據李岩雲先生稱涉及“玉門都尉府上報文書、倉廩責任、私人信件、糧錢簿、邊塞挈令、里程、置驛等內容”。<sup>③</sup> 簡牘現藏敦煌市博物館，尚未全部公布，在李氏諸文中公布了一部分，《敦煌文物》一書中亦公布了10枚左右。

## 6. 陝西省博物館藏敦煌漢簡

這12枚漢簡2000年由陝西省博物館（時稱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徵集而得，當時據傳采獲自武都，周天游主編的《尋找散落的瑰寶——陝西歷史博物館徵集文物精萃》一書有收

① 《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頁。

② 《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

③ 李岩雲《1998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批簡牘涉及的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第132頁。

錄，並作了簡要說明。其後王子今、申秦雁先生作《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都漢簡》一文，<sup>①</sup>對簡逐一進行了解說。嗣後，何雙全先生又有《非“武都漢簡”辨》一文，<sup>②</sup>對這些簡牘進行了“正名”，根據保存狀態、材質、形制、文字和書寫風格以及簡文內容等認為這 12 枚漢簡當為“敦煌漢簡”，同時，何文還對王、申二氏文的釋文有所校訂。

### 7. 一棵樹烽燧所出漢代簡牘

據楊俊先生《敦煌一棵樹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一文介紹，此烽燧為 2004 年 8 月敦煌市博物館在檢查小方盤城遺址西段長城烽燧時所發現，之後曾采集到數枚漢簡，2008 年 12 月開始進行搶救性發掘，共獲簡牘 16 枚，其中 4 枚為無字素簡。而李岩雲先生在《敦煌西湖一顆樹烽燧遺址新獲簡牘之考釋》一文中則說 2008 年元月發現此烽燧，並進行普查，所獲簡數與楊文同，不過李文謂素簡 7 枚，有字簡 9 枚，與楊文不同。石明秀先生《敦煌一棵樹烽燧新獲簡牘考釋》一文則稱此烽燧為 2009 年 1 月敦煌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隊所發現，而簡牘則為隨後的勘察保護中所獲，素簡及有字簡數與李文同。

有字簡中含兩枚晉簡，在晉簡中出現了“煎都”，可知大煎都候官存在的時間可以持續到晉代。簡牘現藏敦煌市博物館。

### 8. 瓜州縣博物館藏簡牘

數量及采集地、采集時間均不詳，《酒泉寶鑑》中公布者為 3 枚，其博物館網站上亦公布有不同的兩枚。

### 9. 懸泉置遺址所獲漢代簡牘

懸泉置遺址在 1987 年首次被發現，到 1990 年開始正式發掘。這期間，陸續采集到簡牘 69 枚，下文所引《敦煌漢簡·前言》謂 64 枚，這些我們就不再討論。下面簡要介紹一下 1990 年正式發掘所獲之“懸泉漢簡”。

據《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可知，整個發掘過程從 1990 年 10 月到 1992 年 12 月共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共開 5×5 米及 10×10 米的探方 141 個，共出土簡牘 35 000 餘枚，其中有字簡達到 23 000 餘枚。其中紀年簡 1 900 枚左右，<sup>③</sup>最早的為武帝元鼎六年，最晚者為永初元年。較完整的編冊 50 餘個。漢代帛書 10 件，均為私信，紙文書 10 件，其中一件為晉代。牆壁題記一處，也就是有名的《四時月令詔條》。

“懸泉漢簡”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據稱簡牘整理已基本完成，不過還沒有正式公布。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懸泉漢簡”材料大都來源於《敦煌懸泉漢簡釋粹》及《懸泉漢簡研究》二書，前者編號 272 個，有些編號下是成冊的，因此含有不止一枚，以簡數來看，共有 357 枚（包括帛書及牆壁題記）。《懸泉漢簡研究》書中除去重複出現的有接近 600 枚。此外，張俊民先生在其所發表各文中亦公布了不少，我們將這些去重後搜集到一處，有一千餘枚

① 該文發表在《文物》2003 年第 4 期。

② 何文發表在《中國文物報》2003 年 8 月 8 日。

③ 據《懸泉漢簡研究》一書稱有明確紀年者達到 2 100 餘枚。



之多。

### 10. 其他散見簡牘

此外，在建國後敦煌等地零散所獲亦有 100 多枚。據《敦煌漢簡·前言》稱：

1986—1988 年間，敦煌市博物館在全市文物普查過程中，又陸續采得漢簡一三七枚。具體出土地點和數量如下：後坑墩，斯坦因編號 T11（以下簡稱斯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號 D20（以下簡稱甘編），計一七枚（D.H.C: 1-17）；馬圈灣墩，此遺址為斯坦因遺漏，未編號，甘編 D21，計四枚（D.M.C: 1-4）；小方盤城，斯編 T14，甘編 D26，計二枚（D.XF.C: 1-2）；臭墩子墩，斯編 T23o，甘編 D62，計二枚（D.C.C: 1-2）；小方盤城南第一烽隧，斯氏漏編，敦煌市博物館文物普查時編號 D.N1（簡稱敦編），計五枚，（D.N1.C: 1-5）；小方盤城南第二烽隧，斯氏漏編，敦編 D.N2，計一二枚，（D.N2.C: 1-12）；鹽池灣墩，斯編 T12a，甘編 D22，計一一枚，（D.Y.C: 1-11）；小月牙湖東墩，斯編 T23g，甘編 D54，計一九枚（D.XY.C: 1-19）；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東南三危山邊的漢代效穀懸泉遺址，計六四枚（D.Q.C: 1-64）；大坡墩，斯編 T3，甘編 D14，計一枚（D.D.C: 1）。<sup>①</sup>

不過何雙全先生在《敦煌新出簡牘輯錄》一文中對這些簡牘的出土地及出土時間的記錄與《敦煌漢簡》有很多不同，這裏不一一引出，我們後面有關於這些簡牘出土及著錄情況的對照表，可以參考。

如果除去“懸泉漢簡”，則現在已經發現的“敦煌漢簡”總數應為  $2\,485 + 2\,398 + 130 + 41 + 14 + 12 + 7 = 5\,087$  枚。這其中還不包括瓜州縣博物館所藏未知數量者。其中 2 485 為《敦煌漢簡》中已經公布的歷次所發現的，這裏面有少量的晉簡，也包含了一部分散見的“懸泉漢簡”；2 398 為斯坦因所獲此前未刊漢簡的數量；130 為 1998 年小方盤城所發現的漢簡數量；41 為清水溝所發現的；14 為夏鼐所獲之前未公布的數量；12 為陝西省博物館所藏敦煌漢簡數量；7 為一棵樹烽燧遺址所獲漢簡數量。如果考慮到這個統計中可能有的誤差，那麼現在所發現的“敦煌漢簡”的數量當在 5 000 枚左右。

## 第二節 漢代的敦煌郡

### 一、敦煌郡的設立時代

漢代的敦煌郡領有今敦煌、瓜州<sup>②</sup>兩市縣以及阿克塞及肅北兩縣的部分地區，是河西

① 《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 年，第 2 頁。

② 原名安西，2006 年更名為瓜州。